

论中庸之道的异化及其重塑

袁 鸿,马建勇,朱开君

(西华师范大学 商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2)

摘要:儒家所提倡的“中庸之道”是一种要使人们都成为君子的道德哲学,它形成了中国人内敛、含蓄的性格。在实际生活中“中庸之道”异化成为“泛中庸”,给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必须对“中庸之道”加以重塑和回归,还其本来面目。

关键词:儒家;中庸之道;异化;重塑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07)03-0023-04

西方有一句谚语:“你以为自己是在游泳,其实是一股暗流在推你前行。”对于中国人而言,这股暗流就是传统文化作用于现实的力量。作为中国几千年来正统学说的儒家思想,更是在历史的不断变换与更替中沉积成为一份中国人所特有的厚重的精神食粮,而儒学所力倡的“中庸之道”则直接构成了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在潜移默化中时时影响着中国人的言行举止和为人处事。

一、“中庸之道”乃君子之道

中国人擅长形象思维,故汉字中象形字举不胜举。对于“中”字,西汉人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指出:“内也。从口。丨,上下通。”^{[1]121}朱骏声则在其《说文通训定声》中作了进一步说明,认为“中”的本义是“当为矢著正也”^[2],意即箭中靶心谓之中。“中”字在儒家那里,主要是指“中正、正确、恰当、适度”的意思,是一种恰如其分地把握事物、协调矛盾的正确思想方法。“庸”字最早出现于中国西周时期的金文里,许慎认为:“庸,用也,从用从庚。庚,更事也。”^{[1]173}意即“庸”乃“常”、“用”之意。汉代的郑玄也解释道:“庸,常也,用中为常道也。”^{[3]132}意为走中正之道是自然人生中的普遍规律。到了宋代,理学大师程颐、程颢则进一步指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4]

对于何为“中庸”,郑玄指出:“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3]132}朱熹也解释道:“中庸者,

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5]所以“中庸”的本义就是指中正、恰当、适度,无过无不及。孔子极为提倡“中庸之道”,把它视为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君子道德标准。根据《礼记·中庸》记载:“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6]“中庸之道”是对人的基本道德要求和最高道德境界,它反对走极端,反对主体精神的高扬和自我的膨胀,提倡人的行为合乎中道,无过无不及,不偏不倚,并有效地保全自己的君子之德,是一种致力于使每个中国人都成为君子的哲学。蔡元培认为,“中庸之道”是从唐尧虞舜时期就开始形成的一种道德哲学,并逐渐积淀为中华民族深层心理结构的特点,进而形成中国人谨慎、内敛的性格;现代新儒学的奠基者梁漱溟将“调和持中”看作是中国文化的属性,认为中庸精神是中国人的本质;冯友兰也极为推崇以中国儒家为代表的“中道”哲学,认为这种“舍其两端而用其中”的方式代表了哲学发展的正确道路。

二、“中庸之道”的异化

儒家所推崇的“中庸之道”要求人人守中而行,但在居中的同时又不失自己道德判断的标准和原则,它的施行实际上缺乏一个明确的标准。孔子也早已认识到一个人既要保持道德判断中的中立角色又不丧失原则与正义确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非圣贤所不能为,因此感叹道:“中庸之为

收稿日期:2007-05-09

作者简介:袁鸿(1975-),女,四川南充人,南充市高坪区委党校讲师,西华师范大学硕士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德也,甚至矣乎!民鲜能久矣。”^[7]正是因为“中庸之道”的“体”与“用”之间的难以一致性,有人抨击其为道德乌托邦,并最终造成了“中庸之道”异化成了“泛中庸”,进而构成了现实生活中中国人的中庸之生存之道。

1、“中庸之道”异化的提出及其表现

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中,异化指人与自身的创造物的对立,这种对立的结果是,“人在劳动中消耗的理论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的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8]即人被自己的创造物所支配和奴役。作为“中庸之道”的异化其具体表现为:

(1)一味追求折衷调和,抹杀事物之间的对立和区别,不讲原则性。孔子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9]211}达到中庸的办法就是“允执其中”,防止走向两个极端,既要克服不及,也要克服过分,真正做到恰当、适度、适中。而实践中有人把不同的思潮、观点机械地组合在一起,抹杀它们之间的对立和区别,遇事模棱两可,调和折衷,见风使舵,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在不同观点的人之间“和稀泥”搞平衡,不讲原则性。

(2)一味强调“中行”、稳定、恪守常道,反对事物的质变和转化。事物都有一个度,超过一定的限度,事物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如果仍然固守稳定、平衡就会阻碍事物向前发展。“中庸之道”不是僵死不变的,而是发展的,对不同的对象、不同的事物,要运用不同的“中庸之道”。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9]26}就是说,没有事必须怎样去做,没有事绝不能怎样去做,要根据实际情况,怎样能达到目标就怎样去做。但是有人却死抱教条,凡事讲求恪守常道,看不到事物的变化,更难以审时度势,选择出最佳方案。

2、“中庸之道”异化的原因分析

(1)中庸概念标准的不明确性。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香港学者黄展骥先生就在课堂教学中展开了对“中庸”的谬误分析。他认为,“中”的概念本身就是成问题的,它有含混性、笼统性、歧义性甚至费解性,它只是一个相对概念,是针对于两极而言的,只有在两极确定的情况下,才可能说事物情况是否为“中”。对于“中庸之道”而言,要持怎样的“中”才是儒家所提倡的恰如其分?在好与坏之间视为“中”,那么在好与不好不坏之间

又是否为“中”?正是因为中庸概念标准本身的不确定性,才给国人更多自由发挥所谓的“中庸之道”的空间,一些折衷主义、推卸责任等行为都被冠之以“中庸之道”,给其异化提供了条件。

(2)缺乏诚信的基础。“中庸之道”所提倡的这种不偏不倚的做人方式,如果不以“诚信”为基础,不以中正的人格为轴心,则很可能成为两面派或一味回避矛盾、不讲是非的好好先生。它强调人的道德行为应表里如一,但如果没有发自内心的道德自觉性和责任感,一切道德行为都不会持久,甚至有滑向伪善的危险。而人又最是能趋利避害的动物,在个体与异化的社会环境的冲突之中,人的本性只会让他选择对他最有利的生存方式,在利益的引诱下,道德约束就显得空乏无力,而没有了诚信的基础,所谓的“中庸之道”就成了伪善、圆滑的代名词,就成了许多人逃避责任、不讲原则的借口和理由,从而导致了现实中的“中庸之道”与其本义的背离。

(3)中庸之道与道家学说的融合。道家学说推崇“顺性命之情”、“清静无为”,是一种消极的处事之学。魏初以来,王肃、刘晏、王弼、郭象等学者都积极推进“儒道兼宗”的观点,力求儒、道两派的融合。儒、道各自代表了人生理想的两种极端。前者是用世或忧世主义,后者是玩世或游世主义;前者是要求人为一种神圣的社会使命而“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后者是主张“顺性命之情”,作人生的逍遥之游;前者是主张积极入世,而后者是主张消极遁世。儒、道二学的融合,就是“中庸之道”与“清静无为”的融合。在世人尝尽世间冷暖之后,这种无为的“中庸之道”便成了最佳的处世哲学,甘求平常,淡泊名利,庸庸无碌,无所无所不为,这样的人生态度更加快了“中庸之道”向“泛中庸”的转化。

3、“中庸之道”的异化所造成的影响

(1)对人性的压抑和制约。“泛中庸”成为了国人为人处事之学,国人自小就接受“明哲保身”、“安时处顺”、“逆来顺受,糊涂应事”的教育,诸如“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等金玉良言更是耳熟能详,这就形成了国人伪善、谨慎、含蓄的性格,人人皆以中庸自居。在学校表现不能太拔尖,要以居中为上,否则是“露头的椽子先烂”;在同事面前要表现谦虚得体,不能趾高气扬,否则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在领导面前更要恭顺服

从,不能持才而骄,否则是“棒打出头鸟”,永无翻身之日。这样的“中庸之道”严重压抑了人积极进取和推陈出新的激情和热情,严重制约了人的全面发展进程。

(2)官场权术之学的兴起。物极必反的辩证思维早已深入人心,历史的种种经验教训教育了为官司者必须持中而行,不能走任何极端。清官虽深得民心,但却两袖清风,并遭人排挤;贪官虽锦衣玉食,但却招来民愤,并不得善终,因此清官、贪官这两种人生极端都不行,唯有在两极之间大搞折衷主义,做不清不贪的官才是上策,清者并不自清,浊者并不自浊。在实际生活中,明明是想收受贿赂,又不明着要,只打几句官腔;明明是想要以权谋私,又不明着说,只说事情难办,这种知行不一的“中庸之道”又派生出了官场隐晦之术、察言观色之学,只有掌握了这套平衡折衷的权术才是为官者的长胜之术,从而演变成为官官皆贪的现实局面,更加助长了贪污腐败的不良风气。

(3)个人主义的不断滋长。对于“中庸之道”所铸成的国民的劣根性,当时尚是北京大学理科学生的胡哲谋在《偏激与中庸》一文中指出:“我国人有一最大之通病,即人人皆好自居中庸,而不肯稍出偏激是已…”,因此,对于真正的忧时、爱国之士而言,“宁为偏激论,而不屑同流合污自居于中庸。”^[10] 儒家的“中庸之道”是积极入世的中庸,是以不逃避责任为前提的中庸,而如今异化的“中庸之道”让国人只会明哲保身,“各扫门前雪”,一切都以个人为中心,对他人、他事都持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态度,更甚而不再忧国忧民,只顾小家而不顾大家。试问,如此麻木不仁的国民又怎么能承担“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神圣使命?又怎么能依靠这样的国民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呢?

三、“中庸之道”的重塑

“中庸之道”的异化促使国民人人中庸,不温不火、不偏不倚、不过无不及的处世态度已不仅导致了人性的扭曲,更是危及到了国家的兴亡和发展。如长此以往,恐怕国将不国。因此,对于“中庸之道”的重塑与回归已是迫在眉睫。

1、“中庸之道”作为方法论是重塑的前提

“中庸之道”作为一种哲学范畴,它主要反映的是对事物本质规律的认识,属于哲学认识论范畴,兼具有方法论意义。它是成就谦谦君子的一

种方法,是修身的一种道德境界,是在勇于承担责任时的一种谦和有礼的态度,而不是一种价值观,更不是一种逃避责任、回避矛盾的借口。既然作为一种方法,那就是仅供人们选择,而不是事事、时时、刻刻都要以“中庸之道”来为人处事。在面对一些无所谓大是大非的事情时,运用“中庸之道”的方法确实能够事半功倍,并能充分体现出自身的人格魄力和知识素养,但在面对一些大是大非、原则性强的事情时,如再采用“中庸之道”的方法的话,那么就会难逃折衷、和稀泥之嫌,而由“君子儒”滑向“小人儒”。因此,必须消去罩在“中庸之道”头上的五彩光环,还归其方法论的本来面目。

2、讲求诚信乃“中庸之道”的基础是重塑的核心

儒家向来重视“诚信”在道德规范中的重要作用,在《中庸》中就提出了“不诚无物”、“至诚不息”、“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等以诚为贵的思想。诚信本身没有阶级性,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必须讲求诚信,否则整个社会都将成为欺诈和谎言泛滥的社会,失去信任和合作,市场经济根本就无从谈起。“中庸之道”是建立在以诚信为基础之上的处世哲学,它要求人们表里如一,诸如谦虚、谨慎是人的崇高品格,而不是刻意假装出来以骗取别人的信任,处世的中庸必须以诚信为支撑,以道德规范来约束,人人都要对自己的道德行为负责,对他人、社会和国家负责。因此,中庸并不等于伪善就如同君子并不等于伪君子一样,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个区别就是中庸是讲求诚信的中庸,以诚信为基础。

3、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是重塑的基本方法

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是指人的学历、能力、品德等综合方面的普遍提高。一方面,“中庸之道”是高境界的哲学概念和范畴,若没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就很难对它形成一种正确的认识和理解,也就根本无法认识到潜藏在“中庸之道”背后的深层次的含义,而就只能对其形成一种浮浅、庸俗的认知,这也就是形成“泛中庸”的一个深刻的现实原因;另一方面,国民素质的提高,能够从内形成一种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能够提高国民对真假、是非、善恶的辨别能力和对公共道德的自觉遵守程度,加强国民的高度责任心和归属感,更在一定意义上加深了对“中庸之道”的认

识程度和理解程度,从而使得“中庸之道”这种君子之道能够在社会上得到更多、更广的共鸣和运用,回归它的真谛。

4. 实行正面引导是重塑的有效途径

对于“中庸之道”的正面引导,要从文化领域和现实领域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学术界要加强对“中庸之道”本义的澄清和回归,渲染儒家中庸思想的文化氛围,深入对它所内含的精华思想

的研究和学习,使其能更准确地为人们提供道德行为规范和标准,更好地引导人们正确认识事物,处理事物;另一方面,社会要加大对社会、国家做出贡献的正面人物的表彰和宣传力度,积极推进英勇人物的大众化教育,加强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从而营造一个真正诚信、公正、和谐的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 [1] [汉]许慎撰. [宋]徐铉校. 王宏源. 说文解字(现代版)[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 [2] [清]朱骏声. 说文通训定声[M]. 武汉:古籍书店,1983:36.
- [3] [清]刘宝楠. 论语正义[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132.
- [4] [宋]程颢,程颐. 二程集·遗书(第七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81:100.
- [5] [宋]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3:18.
- [6] 钱兴奇等注译. 礼记. [M]. 长沙:岳麓书社,2001:694.
- [7] 勾承益,李亚东. 论语白话今译[M]. 北京:中国书店,1992:59.
- [8]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2.
- [9] 李浴华,马银华译注. 中庸.(第六章)[M]. 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
- [10] 马冀等. 新青年选粹[M].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1:391.

The Golden Mean's Dissimilation and Rebuilding

YUAN Hong, MA Jian-yong, ZHU Kai-jun

(Faculty of Commerce,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Sichuan Nanchong 637002, China)

Abstract: "The golden mean" is a moral philosophy that makes everyone to be a gentleman raised by the confucianists and it forms the Chinese's modest and connotative characters. In reality, "the golden mean" dissimilates "common golden mean" and does harm to the Chinese mentally. So "the golden mean" must be rebuilt and recovered.

Keywords: Confucianists; the golden mean; dissimilation; rebuilding